

# 感觉社会学

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是与以显微镜的使用为开端的有机生物科学相对应的。如果说，在此之前，研究被限定在有一定体积、彼此分离的器官上，而且它们的形状与功能上的区别都显而易见的话，那么从此以后，生命过程开始向我们展现它与其最细微的部分——细胞之间的联系，以及细胞之间难以计数、永不止息的相互作用又是如何构成了这种生命的进程。只有了解了它们究竟是怎样的相互连接或者彼此破坏，又是如何相互同化或互施化学影响，我们才能逐渐地明了身体发展，保持、改变自身形式的方式。在一些诸如心、肺、胃、肾、大脑和运动器官等主要器官里，这些生命的基本元素与它们的相互作用结合在一起，形成直接可见的特殊结构与功能。那些发生在生命最细小的元素之间难以计数的事件，实际上只有依靠生命中可见的成分才能组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件当成生命真正的基础的话，那么仅仅依靠对那些主要器官的研究是无法使我们理解生命的互相关联的。

现在的社会科学亦大体上处于这种阶段：我们仅能考察非常庞大与清晰可见的社会结构，并尝试由此提取一种视角，从整体上去观照社会生活。国家与贸易联盟、教会与家庭形式、行会与工厂结构、阶级构成以及劳动的工业分工——这一切与相类似的主要组织和系统形成了我们的社会，并填满了社会科学的领域。

事实上，它们已经是一种较高级的结构形式。许多例子都说明，在它们内部或对它们而言，社会化个体的真实、具体的生活已经是固定了的。除了被提升到与那些综合组织同一层次的联系形式之外，把人类绾结在一起的律动着的生活还呈现出数量众多的其他形式。这些形式尽管总是处于变化不定，难以把握的状态之中，但个体却是通过它们才与社会存在互相联系。

人们相互观照，同时嫉羨着对方；他们彼此尺素传书寄托思念，共进晚餐加深交流；他们对事物有着非功利的同情或憎恶；当他们迷茫时，会向他人求助；当他们为了取悦某人时，会用亮丽的服饰装扮自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总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论是稍纵即逝，还是持续很久；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发生；也许是微不足道，也许是非同寻常。以上这些例子是从人与人之间成千上万种关系中随意选取的，正是它们把人们持续连结在一起。每一天、每一秒，这些纽带被编结，被舍弃，又被重新拾起，旧的纽带被新的所取代，或是与新的相互交织。在其间起作用的是社会原子间的互动，这种只有通过心理的显微镜才能观测得到的互动，支撑着这个真实却又令人迷惑的社会全部的韧性与弹性，多样性与一致性。就我们的经验来看，社会的真实生活肯定不是由那些组成社会科学领域传统内容的客观结构构建起来的。它会分裂成一系列各异的系统，这就好比一个人体内只有形状各异，能被迅速辨认出来的器官，却没有那些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观察得到的细致繁复的细胞活动。

无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普遍存在这样的构想：实际发展的真正动因是繁复多样的影响力之汇总。这个位置原先属于那些灾难性的社会动荡和无所不包的一致力量，因为它们能够决定社会的整体情况与变迁，但现在这些细小得个体几乎难以觉察的影响力已经取而代之。下文要涉及到的研究调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构想，即在社会学领域里，也应相应地更加确切

与深刻地关注研究对象的现实状况，而不是仅仅着眼于那些大型的、绝对超个人的整体结构。感官的相互感知与影响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共存、合作与对立究竟有什么意义，是我们研究的目标。

我们之所以可以进行人际互动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引发了感官效应。既然这是不证自明的不争事实，那么进一步更细致的观察就能够说明，这些人际之间互相传递的感官印象所扮演的角色决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共同基础和前提。每一种感官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它们合力构建了个体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在感官印象的细微差别中也有相应体现；在个体交往中，一种感官获得的印象往往压倒一切，从而使这种交往产生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细小差别，而这种差别如果没有这种感官印象先行的话，是不会产生的。

我们完全通过自己的感觉来认识他人，这引出两种不同的趋势。由于我们过多地依赖于人类的主观感受，因此一个人的表情、语调，甚至身体姿势，往往造成了我们对这个人的喜恶，以及我们自身的兴奋、抑郁、激动或是冷静。所有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他人的承认、评断，而是全然自我的。我看到他或她在那里，继而产生好感或恶感，这种感受只有我一人体验得到。更确切地说，这种对人的感官存在的反应将他人隔绝在自我之外。

感官印象的发展一旦成为我们了解他者的手段，就拓展了另一个趋势：对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仅仅是一座桥梁，我可以通过它将对方变成我认知的对象。讲话的声音与其含义可能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会直接使我们感到喜欢或厌倦，这与他说话的内容无关；另一方面，一个人所说的话帮助我们了解他此刻的思想，又感知他的精神状况。所有的感官印象或许都具有类似的特质：它们既作为主体的情绪与情感，将我们带入主体世界；又作为关于客体的知识把我们引向客体。对非人类的客

体而言，这两方面无疑是相分离的。在这类客体面前，我们可以强调它们的主观情感价值：比如我们感受到玫瑰的芬芳，一种声响的可爱，还有风中枝条的轻轻摇曳，并把这些当成自己精神内部升腾起的一种喜乐。或者说我们想要认识一朵玫瑰，一种声音或是一株树木，为此我们所倾注的精力与前者不同，而且往往不经意地与前者相悖。而如果谈到人，那么这二者就会或多或少脱离具体情境，同时改变、交织成一个整体。我们对他人的感官印象，一方面引发了他们的情感价值；另一方面，这些感官印象还使主体对对象本能的认识，在实际应用中，形成我们与那个人关系基础之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在不同程度上，两种因素——一种噪音的声响与说话的内容，容貌与对它所作的心理诠释，个体气质令人喜爱或是令人生厌，人们由以上这些本能地推论出这个人的精神特质，有时还能推论出此人所属的文化层面——这两种感官印象的发展，依赖于我们与对象的关系。这种依赖的程度很不相同，而且二者的混合情况亦不相同。

在人类所有的感觉器官中，注定只有眼睛才能完成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学任务：个体的联系和互动正是存在于个体的相互注视之中。注视或许是最直接最纯粹的一种互动方式。社会纽带在其他地方编织的网络往往具有客观的内容，或者会产生客观的形式。甚至我们的所听所说也具有客观的含义，而且假如有必要的话，这种含义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传递。然而，相互交错的视线将双方绾结在一起，这最生气勃勃的互动，并没有被固定于任何客观结构之中；双方借由互相注视而建立的一致性在事件与官能之中保持着悬而未决的状态。此种联系是如此微妙与紧密，以至于它只存在于眼神间最直接的交流之中，任何一点偏差，哪怕是视线偶尔的偏离，都会将其独特性破坏殆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视线的互动没有给任何客观性留下空间：在感官功能出现错误的那个瞬间，互动便完全停止。而在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中，

客观性会直接或间接地保有一席之地。与简单的看到或是细致观察某人相比，互相注视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全新且无与伦比的关系。假如这种注视不存在，人际间的种种感觉诸如同情与厌恶、亲密与淡漠都会被完全改变。

射向他人的视线与对他人的观感本身是具表达性的，他人注视别人的眼光也具有相同的性质。这值得注意的事实正证明了此种互动关系的亲密程度。正如人类主体试图去认知客体，最后不得不向客体屈服；当一个人通过注视把他人引入自身时，他也在展现自己。在视线的交流中，没有人只获得而不付出。眼神总是向他人泄露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自我灵魂。很明显，只有在双方互相注视时这种交流才会存在，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注视无疑成就了人类关系域中最完满的互惠关系。由此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羞耻总是使人们望着地面来避免他人的目光。显然，这不仅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保护自己不陷入尴尬的境地。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降低视角可以避免他人探测到自己。因为注视他人不光使我们认识别人，同时也会让他人认识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个性、情绪与冲动会沿着连接两双眼睛的视线传递给对方。通常所说的“鸵鸟战略”在这里是切实可行的：任何个体假使不注视他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对方发现。除非当他人看到自己时，自己也回视对方，否则人类决不会在他人面前完全坦露自身。

然而，眼睛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首先依赖于脸部表情的含义，因为当两个人互相注视时，脸是目光投射的首要对象。人们很少充分意识到，即便是联系中最实际的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双方互相认知——这并不仅仅指所有外部的东西，或者是他人瞬间的意图与情绪。而我们对于他人有意识的或直觉的了解，对他们内在本质的认识，都难以避免地会对我们与他们之间或短暂或长久的关系造成影响。

然而，脸部是所有这些认知集结平衡的中心。它是个体所拥有的生活条件的标志。过去岁月留下的痕迹永远地刻在每个人的脸上，不可磨灭。我们既然能够如此仔细地看出人脸的特征，那么不管我们是否真的这样去做，它都为人际关系带来了某种超实际的因素：人们总是习惯于首先从一个人的外表，而非行动，来建立对他的初步印象。脸使人们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因此，作为表情的载体，脸具有了形而上的性质。虽然，它不会像手、脚或是整个躯体那样行动，它也不支持人们的心理或实践行为，但它的存在却向他人透露了这些行为。

“认知”这种具有特殊社会学意义的类型以眼睛为媒介，又以脸为决定性因素；因为在人与人的相互注视中，脸首先被注意到。“知”与“认知”仍有所不同。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人的第一印象决定了我们对他人的了解。之所以大家通常不注意这一点，是因为，一旦我们有了对他人的初次印象后，便立即关注于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以此来决定我们的具体反应。不过，如果我们尝试去有意识的了解它，那么我们会惊讶于第一印象究竟提供了多少关于他人的信息。当然，我们不能立即说他是聪明还是愚蠢，热心还是阴险，敏感还是麻木。我们很容易将许多人共同拥有的一般性格特质分派给这些常识性的词汇。但是对他人的初次印象却并非这些概念性东西所能囊括——尽管它们通常对之后的认识起到关键性作用——应该说，它是对一个个体通过外表，首先是他的脸，所透露出的个性的一种瞬间把握。所以初次印象经常带有错误和偏颇的成分，但大体上都可以被忽略。

正是由于脸的存在，个体的内在本质以及已经永久性地化为其中的一部分的私人经验都转化成了完全可见的符号；并且个体随着景况不同，表情也可以随时改变。瞬间的情绪、冲动，使人的面部表情产生特殊的细微差异，它们通常体现出个体总体上的

本质。这是人类世界里的独特现象。自我灵魂中那些流动的、易变的，以及独特的、固定的本质以绝对的同时性呈现出来，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互相以对方的形式展现自身。眼睛与耳朵之间最极端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别在于：后者仅仅以一种暂时的形式向我们显露他人，而前者则告知我们这个人的本质，在他的具体的外形轮廓中沉淀下来的过往历程。因此，我们能够同时看到个体生命发展的连续性。

因此，盲人与聋子对待社会的情绪是不同的。对盲人而言，他人仅仅存在于一个其话语的暂时连续性当中，至于其他，例如表情、动作这些特性，以及从人们面容下暗示出的过往经历，都被排除在外。于是，盲人的情绪总是安静平和的，他对其周围环境不存在敌对情绪。面部表情所能透露的多重性正是令人产生迷惑的原因。我们的所见往往是由所闻来解释的，反过来的情形则很罕见。这也能解释为何一个看得见而听不见的人，比听得见但看不见的人更容易感到迷惑、茫然、无助和烦乱。

人类对于此种不同所作出的补偿，在社会学意义上是非常有趣的。尽管说出的话如覆水难收，而眼睛所看到的人则相对稳定，人们还是更容易回忆起所听见的话而不是所看见的物。这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人们比较容易向耳朵撒谎，而面对别人眼睛时却总是开不了口；它也使以下事实变得显而易见：人际互动之本质的支撑物是我们的感官结构与感觉的对象，以及他人作为客体向我们展现的方式与程度。假如我们听到的言语不是立即从耳际消失——而是作为记忆保留下来——假如因为缺乏听觉那种重建以往的能力，视觉感官不能把握到外表的持续性及其内涵，那么人际互动的基础就会全然不同。我们大可不必花费精力去推测这种不同，但意识到这种原则上的可能性能使我们不必拘泥于教条，即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人类社交是完全不证自明、无须争论的，其性质的形成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

历史研究已经破除了关于个别的社会主要形式的教条。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形式和家庭组成、社会习惯和法律制度，都是环境条件的产物。条件不同，产生的后果也随之改变。这些事实使我们明了，我们身处的社会基础决非是最为深厚的，在此基础上一切已成的社会条件也并非是不能变更的，这一基础也不能被当作由某些特殊原因生成的特殊形式。不过，论及人际间较一般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倒不存在。这种最首要最直接的联系决定了一切更高级的社会结构。它看上去是如此自然地与社会性质融合在一起，以致人们往往没能认识到它仅仅是适合于人类的本质，所以它的形成需要从人类的特殊状况中寻找解释。当然，我的论证仅是尝试去揭示我们感官功能的结构中某些能够创造形式的因素，以此来解释人类复杂的生存状况和简单的日常生活联系。

眼睛与耳朵之间的对比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在前面已经作了概述。它很显然是眼睛自我设定的双重角色的延伸。现实的全部含义总是被分成两类，即正在形成的和已经形成的，同样地，在看别人时，这种双重性也控制了个体所能看到的及所想看到的东西。我们力图知道的是：根据这个人现在的样子，他或她究竟是什么人？其本性中最稳固的内质是什么？在此刻，他们像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感官间的劳动分工。如果除去大堆多变的因素，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他人本性中持久的那部分。这类似于地质学中地层的横断面，他们的脸展现出其生活历程，还有那不随时间流逝而变更的个性基石。不过，脸部表情的多样性并不于我们靠听觉确证的差异的多样性相对应。因为我们所听到的是个体瞬间的特性，是他们本质中易于流逝的部分。就算是从一个人的脸色，或者是他们言语中不变的那些方面，也只有通过后天获得的知识和进一步的分析才能让我们了解对方此刻的情绪。在

其他给我们留下直接感官印象的物的性质中，持久的物性与流动的物性往往泾渭分明。永恒的岩石和流动的溪水就是很极端的例子。只有人类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能同时体现出持续性与流动性，而且这两种特性已经发展到能够互相衡量互相表达的程度。此二重性与眼睛那样和耳朵的二重性交织缠绕，产生互动：它们都无法完全脱离双方涵盖的领域，它们必须相互支持与补充，因为眼睛能够确证人类本性中持久和恒定的本质，而耳朵能够捕获那些更加迂回曲折的表达。

从社会学角度看，耳朵与眼睛另一大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后者在互相注视时产生的互惠性。根据其本身的性能来看，耳朵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利己主义器官，它只从外界获得信息，却从不透露自身想法。但眼睛却恰恰相反，信息的吸收与释放总是同步进行。耳朵的外部构造似乎也标志着它利己的特性：它是头部最固定的器官，而且看上去还像是被动地附在上面一样。耳朵的这种利己主义需要付出代价，因为它不能像眼睛那样随意开合，从而有选择性地获取信息；而且，因为耳朵仅仅吸收信息，它就被迫吸收其邻近范围内的一切声响——这一事实具有社会学后果。只有靠嘴和语言的配合，耳朵才能完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吸收与给予行为。但就连这一点也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一个人会在听的时候辞不达意，或者在说的时候不留心听，不像眼睛在神奇的“注视”中把两者熔而为一。

另一方面，耳朵的自我中心主义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它与私人占有客体之间的独特关系。一般而言，人只能占有“看得到”的东西，如果那样东西只是“听得到”，那它只存在于声音响起的那一刹那，所以不存在“所有权”的问题。不过在 17、18 世纪就有例外：当时的贵族家庭拥有专门为自己创作的音乐作品，并且不允许公开发表。巴赫有一大批协奏曲都是受某位王子的委托而创作的。当时的风气认为，拥有仅供自己享受的音乐作品证

明了一个家庭的高贵风雅。这与我们的感官功能其实是相悖离的，因为听觉从本质上来说超越个体的，同一个空间里产生的声音必定会被所有在场的人听到，一个人收听到并不会剥夺其他任何人收听的权力。由这个例子出发，我们可以想到尽管话语很可能只是针对某一个人，但言说在精神上拥有独特的重要性。只要当时在场，任何人都可以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说的话。如果在话语内容中明确排除了这种正常的感官可能性的话，那么这种交流就被染上了一种不可比拟的社会学色彩。

几乎没有秘密可以专门由眼睛来传递。然而，经由耳朵的信号传递则具有矛盾。实际上，听觉信号在本质上是作用于数量无法限制的所有参与者的，而经由耳朵的信号传递则迫使这种形式服务于一个完全排他的内容。这就是口头传递秘密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作面对面交流的特殊性所在。也就是说，它在实际操作中否定了话语信息所包含的感官特性，即该信息是有可能作用于所有在场听众的。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决不会仅有一种面部表情，但是绝大部分人会有同样的听觉印象。我们可以在一个参观博物馆的观众和一个欣赏音乐会的听众之间做一下比较：同一个听觉印象的形成决定了一群人之间可以进行一致与均匀的交流，它使参加音乐会的听众，较之参观博物馆的观众更为紧密地与群体相联系，形成一种在社会学意义上无比亲近且分享共同情绪的联合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眼睛也能为一大群人提供这种由感官印象形成的认同感，从而也产生了公共性的社会效应。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同时望见天空与太阳，这是每一个宗教中都暗含的基本要素。因为，无论是起源还是形式，每一种宗教都或多或少与天空或太阳这些恒常且具支配性的实体有着某种联系。在实际生活中，眼睛这个感官具有很大排他性。通过视角的调整，每个人同时看到的内容甚至也会多少发生改变。然而，有一种内容是确定

不变的——天空、太阳、星辰，人们对于它们的感觉没有排他性，都完全一致。因此，这一事实一方面引发了对人类主体狭隘与独特性的超越，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基于信仰的联合体的观念，这两者是世界上所有宗教都共有的要素。

至此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强调了眼睛、耳朵与它们的客体之间不同的联系。在基于不同感官功能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中，这种联系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关系的不同。工厂车间里的工人、语音室里的学生、军队里的士兵，多少都能感觉到自己属于一个群体。就算一个群体的形成是基于超自然的因素，其性质也是部分地由眼睛的重要性所决定，个体在共同的仪式进程中看得见彼此，但却无法用语言沟通。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群体意识，会比可以进行语言沟通的群体意识更具有抽象的特质。除了已经能够体现在个人外在形象上的个性化方面之外，眼睛比耳朵更能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耳朵传递的是个体各各不同的情绪、想法与冲动的瞬间外在表达，以及主观与客观生活的对立。仅仅是看到一大群人，会比与他们个别谈话更容易形成对他们的大概印象。视觉的非完善性也导致了这一不同。只有极少数人能说出朋友眼睛的颜色，或者用想像勾勒出他们深爱着的人嘴唇的形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过这些东西；很明显，个体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人与别人共同的地方，而这种共同性靠听是听不出来的。

在感官因素具有有效性的范围内，非言谈性的视觉接近，最有助于对不具特殊性的抽象社会结构形成总体印象。根据上述所言，这在很大程度上辅助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形象。“工人”这个庞大的概念，涵盖了所有领域中拿工资的劳动者，不管他们是制造玩具还是开掘运河。这种万能的概念在以往的世纪里是不可能出现的。过去的行会之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他们大多依靠个人的言语沟通，没有工厂车间，也没有大规模的集会。在那些地方，个体看到众多的他者，却听不到他们说话，这样才可能形成

概括了他们之间共同性的抽象概念。如果靠耳朵获得的零碎、具体且多样的信息来培养这种概念，往往会多受阻碍，难以成功。

相比较而言，听觉、视觉以外的较低等的感觉器官具有次一级的社会学重要性；尽管嗅觉独特的模糊性与未发展状况总会使我们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每个人都散发出独特的气味。而这对其后形成的感官印象是无比重要的。该印象具有的两种发展方向——朝向主体的是喜欢或厌恶对象；朝向客体的是对它进行认知——中，气味使前者大大支配了后者。嗅觉不会像听觉和视觉一样独立地形成客体，它始终在人的主观性中兜圈子。我们没有独立客观的词语来详细定义由嗅觉产生的印象，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比如我们说“它闻上去是酸的”，这仅表明该物体与某种尝起来酸的东西有同样的气味。

嗅觉印象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程度，与前面论述的两种感官印象相比是不一样的。听觉与视觉印象无法置身于抽象的层次。由嗅觉产生的对周围人群本能的同情与反感，与思想、意志之间的抵牾与前者相比会弱得多；举例说来，这种本能的同情与反感往往会显著影响到居住在同一领土上的两个不同种族间的关系。在北美，黑人要被高级社交圈所接纳是绝不可能的，原因是黑人身上有种体味，而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模糊的反感也被归咎于气味。目前，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人们大力提倡有识阶层与工人之间的个人接触，有识阶层也把令所谓“彼此隔绝”的两个世界再次靠近的理想当成一种伦理道德的理想；但这二者的失败却不过是因为嗅觉印象实在无法被改变。假设从道德和社会利益角度来考虑，那么许多上等阶层的成员都无疑会为此目的牺牲舒适的个人生活，会为了被剥夺者的利益放弃许多特权和生活乐趣。而这一切尚未实现的原因只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发现使之得以实现的正确途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宁愿忍受这些放弃与牺牲，而不与这些身上粘满了“辛劳汗水”的人们进行身体接触。社会问题并

不单纯是个伦理问题，还是一个气味问题。

当文化变得越来越精致，所有感官的敏锐性实际上都被削弱了，相反地，人们此时却更加关注自身的好恶。这一事实对社会文化所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今尚未被正确地认识到。事实上，我相信高度发达的感受力沿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往往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和反感，远远超过初始时拥有的欢乐与魅力。现代人被无数事物所震撼，他们的感官简直无法忍受这些事物。假如他们的感官不那么敏锐，情感模式不那么细腻的话，这些反应是不会产生的。必须与此联系起来看的是现代人个性化趋势和愈益明显的个人义务上的选择自由。个人的反应模式有时是直接感性的，有时又是符合审美的，这就使个体不可能立即加入传统的联合体或者封闭的契约团体之中，因为这二者并不关心个人的品味或感受。于是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个人的孤立，个人领域受到更为强烈的限制。这种趋势也许在嗅觉上最为明显。当今社会越发重视卫生与清洁度的做法既是这种发展趋势产生的原因，也是其造成的结果。

总的说来，随着文化的发展，感官对远距离事物的感受力越来越弱，对自身周围的感受力却越来越强；我们变得不仅短视，而且感觉迟钝，然而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却非常敏感。从一开始，嗅觉已经比视觉和听觉更早地适应了近距探测；而如果我们不再能像一些嗅觉敏锐的原始人一样，用鼻子客观地感受到那么多东西，那么我们会对自身嗅觉形成的印象更加敏感。在其他感官中也有这种趋势，但嗅觉较之其他更为明显。一个具有敏锐嗅觉的人感到的不适，一定要比他从嗅觉的精致化中得到的乐趣多得多。

下面要说的更增加了那种由感官的精致化带来的孤立的反感。通过闻某物，我们把这一印象，或者说这个发散着气味的对象引入到自我的深处，引入到我们存在的中心；我们吸收了它，通过呼吸这一与自身如此亲近的重要过程吸收了对象，这种亲密

是其他感官与其对象不可能做到的——除非我们吃了它。闻一个人的体香是在获得对他人的一种最亲密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们以一种气体形式渗透进我们最感性的内在。很明显，伴随着不断增强的对嗅觉印象的敏感度，这无疑导致了一种选择和距离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现代人社会选择的一大感性基础。因此，现代人具有一种像尼采那样极端排他的个人主义倾向是很典型的。尼采对他所憎恨的人类类型有这样的著名言论：“他们闻起来不对劲。”

如果说其他感官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如果说它们总能够用吸引力调和造成的反感，如果说它们形成的积极与消极的情感价值相互交织，影响了人际间一切具体的关系——那么，嗅觉恰恰是把这些联系加以瓦解的感觉。这不仅是因为它传递的相互排斥多过相互吸引，也并非单单因为它而来的判断具有某种激进与令人反感的性质——而且这种判断一经作出，其他感官或知识都很难推翻它——而是因为人群的聚集从来不会给嗅觉提供任何它能给其他感觉提供的诱惑力，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实际上，一般说来，嗅觉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与集结的人的数量是成正比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仅仅通过这种嗅觉的精致化，文化的发展就造成了个体的相互隔绝，至少在较为寒冷的国家是如此。而在南方国家，温暖的气候使人们有了户外活动的机会；也就是说，没有了在嗅觉方面的不便会对社会交流形成某种影响。

调查在此处中止，其不完整性我是意识到了的。但或许由此我打开了一扇门，它通向的那个地方，可以作为考察人类具体生动的社交条件的出发层。如果有人希望从其具体的力量着手，理解社会之网——社会学迄今为止仍只关注这张网最高的现象层面的最终完成模式——的话，那么了解把人与人联结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精细丝线，就不再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了。

## 交际社会学

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长久以来都有争论。一方把社会的重要性神秘地夸大，主张是社会使人类具有现实性；另一方则认为社会仅仅是个抽象的概念，正如我们把树木、小溪、房屋、草地统统称为“风景”那样，观察者把现实中个体的人归入一个整体，称为“社会”。但不论持哪一种看法，我们都必须承认社会的现实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个体的人作为直接可感的存在，作为相互关系发展进程的承载者，通过这些进程形成一个更加高级的被称为“社会”的团体；另一方面，个体自身所拥有的兴趣促成了这种团体的形成。这些兴趣可以是经济上的，可以是体力或情欲上的，或者是宗教慈善事业上的。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并达到这样的目的，难以胜数的社会生活形式应运而生。国家与社团、教会与经济联盟乃至家庭与俱乐部团体为个体提供了互相帮助，互相容纳，互相对立与互相沟通的共存空间。原子相互之间产生的能量效应使物质有了各异的形式，我们统称之为“事物”。同样地，自身内部的冲动与利益，把个体推向他人的世界。这种冲动与利益，像原子一样，导致了所有社会关系形式的产生，也正是这些关系使彼此分离的个体组成了“社会”。

在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这个群体内部发展出，或者说由这个群体产生出，一种相对应于艺术和游戏的社会学上的特殊结构；它们从现实中提取自身的形式，又将现实撇在身后。对艺术

或者游戏的冲动是否有阐释的必要，可能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至少它使人们注意到，游戏与艺术活动内容上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元素。无论是进行体育运动，还是玩扑克牌，或者是欣赏雕塑，聆听音乐，人们都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着模糊的满足感。这种共同的满足感，与音乐或是雕塑的独特性无关，它的产生只是由于后二者属于艺术范畴而前二者属于游戏的范畴而已。这种类似于心理学上的反应与需要的共同元素，存在于所有这些不同的事物之中——在由那些事物的独特性引发的特殊快感中，这种共同元素极易被辨别出来。这也可以被用来解释人类的社交冲动。确切说来，出于特殊的需要和利益，人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诸如经济团体、血缘亲族、邪教组织或抢劫团伙。但是，如果撇开这些团体的不同内容不谈，我们看到的是，在它们之中，个体与他人相联系，孤独感被这种群体的联系性所消除。所有的团体都在情感上依赖于这一事实，并享受其带来的满足感。当然，就个体而言，这种情感会与反向的心理因素相抵消：交往会变成一种负担，一种为了达到某种客观目的，而不得不忍受的负担。但是，在所有有效的交往动机之中，也存在一种具代表性的积极情感，一种努力推动交往的驱动力。只有假以时日，这种动力才会形成那种能够使这些特定交往持续下去的客观内容。正如我所言，艺术的原动力从可见事物的复杂性中提取自身形式，然后将这种形式塑造成与自身相对应的特殊结构；同理，社交冲动是把交往与交往过程的纯粹本质，作为一种价值和满意感从社会生活现实中提炼出来。这就形成了狭义上的社交性概念。所有社交性——包括那种纯粹自发的，假如它会变得有意义而且稳定的话——都对形式，特别是好的形式无比珍视。这决不仅仅是个语言的问题。因为“好的形式”是一种双向的自我定义，是元素的互动，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联合体；而且既然在社交性中，与生活目标紧密相联的具体动机可能互相抵消，那么纯

形式、自由参与以及个体互动产生的相互依赖性就必须挺身而出，控制全局。

戏剧从生活的真实性中获得了其伟大、根本的主题：人类本性中的追逐与奸诈；对自我精神和肉体能力的确证；对机遇的倚赖与竞争，以及对个体无法控制的力量青睐。在物质世界中，以上各种行为造就了生活严肃的面容。而戏剧则从其中摆脱出来，兴高采烈地展现着使它与纯粹休闲娱乐相区别的象征意义。这更加显示出它作为社交性本质的面目；戏剧的实质是从人间为数众多的基本交往形式中获得的。这种实质虽然排除了生活中正常交往应有的龃龉，但从其与真实生活的正式关系中，产生了一种社交性。这种社交性越接近纯粹，就越是在象征性地模仿完整的生活，也就越发具有了一种肤浅的理性主义只想在其内容中寻找到的意义。无法在戏剧中被证实的理性主义，于是试图把社交性当成无用的废物加以抛弃，这正如博学之士常常对艺术品发出质疑：“它到底证明了什么？”在许多语言，也许是所有的欧洲语言中，“社会”（*Gesellschaft*）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在一起”。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出于某种目的组成的社会还是“社会”；但只有“好交际的”的群体才是一个没有适当形容词加以修饰的社会，因为它自己已经体现出了形式的纯粹、抽象的一面，而消除了任何片面的、修饰性的社会内容。

那么，社交性就是交往的运作形式，它与由内容所决定的具体交往的关系，和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样。社会交往所遇到的突出问题，即属于个体的特殊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问题，现在只有通过社交性才可能解决。既然社交性是一种纯形式，它没有隐蔽的最终目的，没有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在自身之外的结果，所以它完全是以每个人的个性为中心，且与之相适应的。同时也因为社交性只是能够满足社交冲动——虽然它之后能留下一定反响——不论是在其发生的条件或是其产生